2001 中国年度最佳报告文学

2001 ZHONGGUO NIANDU ZUIJIA BAOGAOWENXUE

上

张锲 周明 那非 选编

漓江出版社

2001 中国年度最佳报告文学 上

2001 ZHONGGUO NIANDU ZUIJIA BAOGAOWENXUE

张锲 周明 那非 选编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01 中国年度最佳报告文学/张锲等选编．—桂林：漓江出版社，2001.12

（年选系列）

ISBN 7-5407-2799-3

Ⅰ.2… Ⅱ.张… Ⅲ.报告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4544 号

2001 中国年度最佳报告文学（上、下）

张锲 周明 那非 选编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政编码：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计委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24.25 字数 696 千字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 000 册

ISBN 7-5407-2799-3/I·1674

定价：35.00 元 上/下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2001:报告文学持续繁荣
——编者的话

有人预言,21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在21世纪肇始之际,中国可谓喜事连连:先是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以绝对优势获胜;继之是中国男子足球队提前两轮出线,进入2002年世界杯决赛;再者是11月10日多哈会议正式通过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凡此种种,都无不使亿万中国人民扬眉吐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的经济定会继续保持稳定,并得到较快发展,小康社会指日可待。而在国际上,2001年前后则是风云变幻,大事接踵,小事不断。俄罗斯和平号空间站坠毁,库尔斯克号核艇沉没,"9·11"恐怖袭击,纽约世贸中心大楼倒塌,为捉拿本·拉登,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塔利班喀布尔沦陷,上千平民伤亡。一个多极化的世界正在形成,任何一个妄想称霸地球主宰人类命运的国家都不复存在。这种国际社会动荡不居、变动频繁,国内深化改革、机遇与困难相伴涌现之机,忙煞了新闻记者,也忙坏了报告文学作家。我们所处的时代,正是报告文学作家大有可为、可有大为的时代。

报告文学向来被喻为文学战线的轻骑兵。检阅2001年度报告文学,这种轻骑兵的特点更是彰显无遗。新世纪开端之年,中国经济发展成为举国关注的中心,描述国有企业改革及实业界风云人物的报告文学层出不穷,《海尔中国造》、《集团突围——世纪腾飞的广州国企》、《布吉镇的风流人物》等是其中的代表;中国体育继去年在悉尼奥运会上勇夺28枚金牌之后,今年男足成功出线,又逢申奥成功,一些体育题材的报告文学引起读者瞩目,亦在所必然;科教方面,反映去年开始实施的高校扩招及其深远影响的《闵维方的选择》,中国成功发射和回收"神舟"号宇宙飞船,揭示中国载人航天事业进展的《中国宇航员准备出

征》;反腐倡廉法制题材方面,揭露厦门特大走私案的《风暴——查处厦门特大走私案纪实》,探讨张金柱案件带给人们启示的《问"法"中原》,等等,这些描写"尖端题材"的报告文学,因其对现实生活的高度贴近,必然受到广大读者的热情关注和喜爱。《北京文学》杂志本年度因接连发表几篇探讨教育热点问题的报告文学,如刘元举《不能光记住泪水——一个郎朗与一群郎朗的故事》(节选),何建明《恐惧无爱——中国"另类孩子"的生存报告》等,也深受读者欢迎与好评。

其他如本年度特别受到广泛关注的农村农民生存状况、西部大开发和地质灾害、环保"善待家园"的几部表现当前社会突出问题的报告文学,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作品。需要特别提出的,还有几部历史性纪实、传记类报告文学作品,其中如中科院院士王大珩先生亲自撰写的《我的半个世纪》,李辉同志撰写的《石破天惊来临时——外国人眼中的"西安事变"》,董保存同志撰写的《名将记趣》,王黎拓同志撰写的《潘汉年与董慧的生死恋》以及老作家金敬迈同志撰写的《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哪》等,都很值得一读。

综观本年度报告文学,成绩是显著的,令人欢欣鼓舞,从中完全可以了解和把握到国内外新近发生的大事要事,活脱脱是一部部、一篇篇当下现实生活的生动记录。作为编者,我们期望一年一度的报告文学选,能够成为中国在由大国逐步迈向强国的过程的见证,成为中国发展进步和世界动荡变革的一部编年史。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广大报告文学作家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社会现实变革中去,投入到令世人惊喜的改革开放事业中去,也需要有更多像竹林这样的小说家和散文家,加入到报告文学创作的队伍中来。大家共同以饱满的激情写出更多反映时代变革的、为读者所喜闻乐见的报告文学作品,促进报告文学创作的持续繁荣。

在本书的编选过程中,得到了许多作家和编辑朋友的热情帮助,漓江出版社的领导和责任编辑予以不断的督促,是本书得以顺利编辑出版的保证,也是让我们心怀感激的。

编 者

2001 年 11 月 于北京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科教风云

我的半个世纪…… 王大珩（1）
世间克隆第一人…… 周静书（32）
中国宇航员准备出征…… 舒 云（47）
闵维方的选择…… 王宏甲（96）

当代先锋

海尔中国造（节选）…… 颜建军 胡泳（123）
追随太阳升腾
——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创业传奇…… 饶原生 曾应枫（154）
布吉镇的风流人物…… 李玲修（173）
在巴基斯坦的土地上…… 孙 进（216）
普 度…… 竹 林（230）
川藏线上生死劫…… 党益民（259）

史海钩沉

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哪…… 金敬迈（302）
潘汉年与董慧的生死恋…… 王黎拓（374）
石破天惊来临时
——外国人眼中的“西安事变”…… 李 辉（379）

名将记趣…… 董保存(400)

特别关注

巴金的梦…… 周　明(443)
哈佛快活吗？(节选)…… 陈祖芬(452)
东帝汶维和亲历记(节选)…… 徐志达(473)
中国家庭钢琴热带来的喜与悲…… 刘元举(492)
恐惧无爱
——中国"另类孩子"的生存报告…… 何建明(545)
善待家园
——中国地质灾害忧思录…… 吴　岗(597)
380毫米降水线
——世纪之交北方的农村和农民…… 鲁顺民(645)
官员堕落揭秘 ……
张贤华　庄东贤　叶卫华　闻涧　宏云　安洁　泰峰　苏帆(695)
问"法"中原
——张金柱案件启示录…… 沉　钟(714)

我的半个世纪

王大珩*

只要能做事就成

1950 年的秋天，钱三强突然捎信约我到北京去一趟，说有要事相商。

我知道三强在建国开始就参与了筹建中国科学院的工作，此时，他已经担任了中国科学院行政秘书长的职务，没有十分重要的事情，三强是不会轻易叫我专程到北京去一趟的。因此，一接到三强的信，我立刻匆匆赶赴北京。

几年不见了，三强还像以前那样热情开朗，只是于言谈举止中增添了几分干练，几分老成。一见我的面，三强就笑着问我，大珩，现在挺好吧？我也笑着回答说，现在当然好了！我们这是不约而同地想起了莎翁故乡那个美丽的湖，想起了湖上那次决定我们前途的谈话。我们很庆幸自己能及时回到祖国，亲眼看着新中国的诞生，亲自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

* 王大珩，江苏苏州人，1915 年 2 月 26 日生于日本东京。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1936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8 年留学英国，获伦敦大学帝国学院技术光学专业硕士学位。历任中国科学院长春分院院长，国防科委十五院副院长(兼)，中国光学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国防军工科学研究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86 年与王淦昌、陈芳允、杨嘉墀联合向中央提出了发展我国高技术的倡议(863 计划)。本文原载《神剑》2001 年第 4 期。因王大珩先生年事已高，本文系由王先生口述，马晓丽同志记录整理而成。最初由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0 年出版，书名《七彩的分光》。

说了几句话后，三强突然转了个话题问我："大珩，还想光学玻璃吗？"

我愣了一下，回答说："怎么不想，做梦都想！"

三强又笑着问："那你想不想得到个机会呢？"

我立刻警觉地看着三强。

三强却笑而不语。

我单刀直入地说："别卖关子了，三强。说吧，找我来有什么事？"

三强收敛了笑容，认真地说："中科院要建立一个仪器研制机构，我想推荐你去挑这个头，不知道你是否愿意。"

我的心一下就跳了起来。

三强继续说："大珩，我认为你最适合做这件事。你本身是搞应用光学的，又在工厂干过。而且我知道你一直就想搞光学玻璃，想发展我们中国自己的光学事业，我想，对你来说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机会！这是两个多么诱人的字眼儿。世间所有的人终其一生都在追寻着各种各样的机会，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有幸得到适合于自己的机会的。我父亲就是这样，他有才气有能力但却生不逢时。他苦苦地追寻了一辈子的就是机会。而我在经历了许多次的努力和失望之后，终于有了这样一个毕生向往的机会。我只觉得浑身的血都在往上涌，心里产生了一股压抑不住的冲动。

三强说："这个机构就叫仪器馆吧！因为这个机构不仅要负责研究工作，还要担负制造任务，兼有研究所和工厂的两种性质，叫所或厂都不合适……"

"好！这种结构是最合理的。必须要有工厂，否则什么事情也做不成的。"还没待三强解释完，我就兴奋地打断了他的话。

三强笑了笑，补充说："就是名字不太好听，馆长。"

我毫不犹豫地说："馆长就馆长，只要能做事就成！"

三强就详细地向我说明了情况。原来，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科学院副院长李四光、卫生部副部长贺诚、教育部副部长韦悫和文化部副部长丁西林等 4 人就联名向政务院提出设立我国仪器研究制造部门的建议。鉴于科学仪器在科学技术发展中的重要作用，1950 年 8 月 24 日，

政务院会议通过了他们4人的提议，决定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仪器馆。仪器馆不是一个单纯的科研机构，它兼有研究和制造两个功能，必须寻找一个既有物理基础又懂得机械原理，能把光、机、电结合在一起的人来做这件事。三强就想到了我。

1951年1月24日，经钱三强推荐，中国科学院决定，任命我为仪器馆筹备委员会副主任，负责主持仪器馆的筹备工作。在经历了许多曲折之后，我终于如愿以偿地得到了一个发展光学事业的机会。我知道我面前的路很长，也知道在当时那种条件下开拓光学事业的艰难，但我充满了信心。

当我进一步对我国应用光学领域的整体现状作了了解之后，才真正地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说起来，不免令我们这些炎黄子孙汗颜。当科学技术发展到20世纪中叶的时候，当西方国家已经进入原子能和电子领域，当应用光学已经在第一第二两次世界大战中得到飞速发展，开始在诸多科技领域里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的时候，中国的应用光学却还处于几乎空白的可怜状态。偌大一个中国，做不出一块光学玻璃，造不出一台真正的精密光学仪器！当时，还算有点模样的只有一个国民党留下来的厂子——昆明光学仪器厂。昆明光学仪器厂是在国民党军工部门的几个知识分子的努力下办起来的。据说这是几个良心不错的知识分子，他们曾被国民党派往欧洲购买军火，因而得到了对方一笔数目很大的回扣。难得这几位知识分子在贪污腐化成风的国民党队伍中还能保持自身的清白和良知，他们没有把这笔回扣揣到自己的腰包里，而是用这些钱在欧洲购买了一些设备，运回国办起了光学仪器厂。这个厂的技术水平当时在国内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不仅设备是进口的，就连人员也经过瑞士威尔德光学仪器厂技师的指导。但即便就是这个厂，也只能生产出一些低倍率的光学望远镜和极简单的测距仪。

摆在我面前的就是这样一种现状。在旧中国留下的废墟上，我寻找不到一处可以完全利用的基础，中国几乎就没有应用光学！

“没有”，这是一个最能令人灰心沮丧的现实了。在“没有”面前，我们一般的反应大多是失望、退却和逃遁。但对有些人来说，“没有”却往往是一个最可以引起兴奋的现实，因为“没有”，你才可能得到一个新的

发展的空间；因为“没有”，你才有可能从事一项具有开创意义的新事业。我想，我就是冲着“没有”这两个字来的。如果中国“有”，从前，我也许就不会那么孜孜以求了；如果中国“有”，现在，我或许就不会这样百折不挠了。无论如何，我是绝不会因为没有而退却的。从此，我开始了一生的追求——发展祖国的应用光学事业。

1400 万斤小米

我领到的第一笔筹建仪器馆的经费，是 1400 万斤小米。

用小米作为计酬物，这在今天听起来似乎显得很可笑，但在解放初期新的货币制度还没有形成的时候，以小米为计酬物的方法曾一度被广泛使用。不仅拨款用小米代替，甚至连人们的工资都是用小米来代替的。两个人见面不是说我每个月挣多少多少钱，而是说我每个月挣多少多少斤小米。按当时的行情计算，一斤小米 7 分钱，我领到的 1400 万斤小米折合成旧币约有 98 亿元，而这 98 亿元的旧币折合成现在的人民币则只有 98 万元。

说实在话，这点钱自然是不够的。但我心里清楚，我们国家穷，旧中国给我们留下来的这个烂摊子千疮百孔，没有一处不需要修补、重建。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能拿出一笔钱来发展仪器事业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不够的部分必须靠自己，也只能靠自己来解决。

怎么办？思虑再三之后，我把目光转向了东北。

东北当时是我国重工业最集中的地方，工业基础比较雄厚。而且，由于东北地区解放早，所以社会环境相对稳定，政府资金也比较充足。当时的东北科学研究所所长武衡很豪气地对我说：“到东北来吧。到了东北，给你筹个五六百万成个啥问题！”

我几下东北，经过详细考察后决定把仪器馆迁往东北，设在长春市。

近几年，我常常不由自主地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当初我主张把仪器馆设在长春这件事，究竟做得对不对？直到现在还常有人用开玩笑的口吻责备我，说你当初干吗非要把仪器馆建在长春呢？如果不是你，我们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就都在北京了，就都是北京人了。北京的条件多好！我就想，是啊，当初我为什么一定要把仪器馆建在长春呢？我这样做到底对不对呢？想来想去我得出了一个结论：我做得对。无论从过去和现在来看，我当初这样做都是没有错的。长春有工业基础，有一定的条件，有利于光学事业的发展。那时候，我心里的目标就是要把长春建成中国最大的光学基地，建成像德国的“蔡司厂”那样世界闻名的光学城。现在长春不是真的成了我国最大的光学基地了吗？长春是个好地方，长春为我国光学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对长春一直怀有一种非常深厚的特殊感情。

我又反过来想：那么，究竟是哪里不对头了呢？想来想去我又得出了一个结论：是时代不同了，人的观念不同了。我们那代人，能得到一个机会为国家做点事情，就心满意足，再也不会去计较什么了。现在可不同了。有一回，我女儿的一位同学考上了长沙国防科技大学，他问我去那里好不好。我回答说，好哇，当然好！女儿却在一边用鼻子哼了一声，说，学校好算什么好？爸爸好才算好呢！只要有个好爸爸，上再差的学校毕业后也能分配到好的城市，分一份好的工作。爸爸不好，上再好的学校也白搭，等着毕了业去边远地区钻穷山沟吧！我当时很吃惊，没想到现在的年轻人想问题这么实际。我不是反对年轻人要实际一些，但实际也有大小之分，不能只顾了个人生活的小实际而不顾国家的大实际是不是？前几天有人告诉我，说现在高校毕业分配时学生们都抢着要去“天南海北”。我说这很好嘛。人家就笑，问，你知道什么是“天南海北”吗？我说那当然是指边远地区了。人家这才告诉我，什么边远地区呀，那是指天津、南京、上海、北京。原来是这么个“天南海北”！一提起这些来，我心里就很不舒服。我们这代人是习惯了把做事放在第一位的，个人生活其次。我们做起事情来，从来不会从个人生活的角度去考虑问题，都是从国家考虑，从事业考虑。无论是怎样艰苦的地方，大家都是高高兴兴地打起铺盖卷说去就去了。

我刚到长春的时候，长春城战后的那副样子简直是满目疮痍。整个城里找不到一棵有皮的树。在几年前那场长达5个月的围困战中，城里所有的树皮都被饥饿的老百姓扒光了，吃掉了。先从榆树皮吃起，待榆树皮扒完以后就不管什么树都扒、都吃了。听说后来连吃死人肉的都

有。据说，那一次长春城里活活饿死了 15 万人！满眼都是残垣断壁，到处都是拆掉了房顶的房壳子，走遍全市也找不到几座完整的屋顶。房子也都是在那场围困战中拆掉的。因为没有烧的，人们只好把木制的房架子拆下来烧掉了。其实，当时烧掉的不只是那些房架子，所有能点燃的东西都找出来烧了，包括路边木制的路牌子，甚至包括沥青路面，统统都被抠下来烧掉了。据统计，全城共破坏了 230 万平方米的建筑！

那时候，城里的空地皮和空房子有的是，缺的就是人，尤其是像我们这些来搞建设的人。所以，只要我们提出来要哪个地方，军代表立刻就会批给我们。当时，市中心有的是好地方，但是我偏偏就看中了当时最脏、最破、最偏僻的铁北区了。铁北是长春市的工业区，工厂大都集中在那里。我看上铁北，是因为我看到铁北矗立着一个完整的大烟囱。没有烟囱建不起熔炼玻璃的炉子，搞不了光学玻璃，这个现成的烟囱能为我们节省 6 万块钱呢！所以，一看到那个大烟囱我就乐了，我立刻指着那个大烟囱说："我就要那个大烟囱了！"于是，铁北天光路那一大块地方就归了我们了。

现在谁也不会想到，我们筹建仪器馆是从盖房顶、填炮弹坑、清除破坦克开始的。铁北天光路那个大烟囱旁边是一大片空旷的场地，场地上到处是炸弹坑、碎弹片和被打烂了的废弃坦克。我领着我带来的第一批 28 个人，在这片千疮百孔的土地上一锹一锹地挖，一镐一镐地刨，硬是为仪器馆开出了一片地方。

1953 年 1 月 23 日，中国科学院仪器馆在长春正式成立。中科院院长会议决定，由我担任仪器馆副馆长，并代理馆长职务主持仪器馆工作。

第一炉光学玻璃的诞生

筹建仪器馆，我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龚祖同。

当初，我刚刚回国的时候，龚祖同曾真诚地邀请我去他那里共同研制光学玻璃。虽然由于客观情况不允许而失去了这种可能，但那一次与龚祖同的短暂接触，却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龚祖同长我整整 10 岁，我入清华物理系的那一年，龚祖同已经是清华物理系的研究生了。研究生毕业后他又去德国留学了 4 年，在柏林工业大学攻读应用光学专业。1938 年龚祖同回国。从那时候起，他就一直为发展中国的光学事业，为研制光学玻璃而四处奔波。但是，他从昆明到贵阳，从秦皇岛到上海，整整奔波了 10 多年，吃了无数的苦，碰了无数的壁，最终却一事无成。

我很理解龚祖同。我看出龚祖同是一个对国家、对事业有着极强的责任心的人，是一个与我有着共同的追求、能够踏踏实实做点事的人。所以，筹建仪器馆后，我立刻给龚祖同写了一封邀请信，诚心诚意地恳请龚祖同前来担任仪器馆光学玻璃实验室的主任。我在信中还承诺要为龚祖同提供研制光学玻璃的一切必要条件。我相信，只要有了能搞光学玻璃这一条，龚祖同就一定会来的。

龚祖同果然欣然应允，立刻举家北迁，前来相见。

这是我们相识后的第二次见面，距第一次见面仅仅只有 3 年的时间，真没想到，才过了 3 年，眼前的一切就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3 年前是龚祖同邀请我，而这一次则是我邀请龚祖同了。3 年前，龚祖同邀请我的时候中国还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呻吟，中华大地烽烟四起，生灵涂炭；而 3 年后的今天，祖国已是处处莺歌燕舞，一派社会主义建设的蓬勃景象了。相见之后，我们两人心中不禁感慨万千。

我立刻任命龚祖同为光学玻璃实验室主任，并郑重地把自己最看重的研制光学玻璃的工作交给了龚祖同，同时交给龚祖同的还有我积累了十几年的经验和我在英国研究出来的光学玻璃配方。龚祖同十分激动。

也许有人会问，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为了光学玻璃，已经追求了许多年，牺牲了许多唾手可得的个人利益，作了许多的学术准备，但我为什么要在条件成熟、机会来临的时候，把自己积累的宝贵经验交出来，把一个难得的机会让给别人？难道我就不想出成果，不想亲手研制出光学玻璃，了却自己心中多年的夙愿吗？

说老实话，我何尝不想！这显然是一件谁做谁出成果，谁做谁出名的事。哪一个科学家不希望从自己的手中出成果？哪一个科学家不希

望亲手填补国家的空白？哪一个生活在现实中的人不希望获得更多的荣誉？我也是凡人，我既有作为科学家的对科研工作的痴迷和热爱，也有作为凡人的对荣誉的追求和崇拜。那么，究竟是什么促使我这样做的呢？

是责任！责任，是可以使一个人在瞬间完成某种转变的巨大砝码。当我接下仪器馆的工作，开始用中国科学院仪器馆馆长的眼光看问题的时候，当我意识到发展中国光学事业、精密仪器事业的重担已经压在我的肩头的时候，我就已不再是昨天的我了。这时的我心里已经容不下丝毫杂念了，我只剩下了一个念头：尽快搞出中国自己的光学玻璃来！

龚祖同果然没有辜负我的信任，他立刻以极大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之中去。在最初那些艰苦的日子里，龚祖同一边风餐露宿同大家一起艰苦创业，一边亲自动手设计出了玻璃炉和光学玻璃的后处理设备。我无条件地支持龚祖同，和龚祖同一起带领大家，就着铁北的那个大烟囱，一砖一瓦地砌起了第一个玻璃炉，盖起了一座玻璃熔制厂房。有了这些基本的条件，龚祖同很快就把光学玻璃的研制工作开展起来了。

中国科学史永远地记录下了这个日子：

1953 年 12 月，中国科学院仪器馆熔炼出我国的第一炉光学玻璃。中国第一炉光学玻璃的诞生结束了我国没有光学玻璃的历史，为新中国光学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中国第一炉光学玻璃的后面永远地留下了龚祖同的名字。我对此没有遗憾，没有私念，只有对学长龚祖同的真诚祝贺和感激。

八大件，一个汤

1956 年，我受国家科委的邀请，参加了制定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十二年远景规划的工作。这项工作极大地开阔了我的眼界。当时，我负责起草光学、精密仪器发展方面的有关条款。在我和一些人的建议下，规划中把发展我国仪器制造事业、提高我国仪器制造的科学技术水平列入了重要项目之一。

但是，在制定规划时发生的一件事，却使我始终耿耿于怀。我们在制定规划时，一直有苏联专家参加。在制定的过程中，苏联专家的意见往往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时，我和我的同行们提出要把研制电子显微镜列入规划，但这个意见却立刻遭到了苏联专家的反对。因为那时候世界上只有极少数几个发达国家能做电子显微镜。记得苏联专家当时轻蔑地打断我们的话，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口气断言说："就你们目前精密仪器的落后现状来看，12 年内你们中国根本就不可能做什么电子显微镜！"当时的情景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我始终忘不了苏联专家那居高临下的神态和轻蔑的语气。1957 年 4 月，中国科学院仪器馆更名为光学精密机械仪器研究所，我担任所长。60 年代初，该所又更名为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人们简称为长春光机所。

1958 年 4 月，我在外地开会期间，中国科学院光学研究所来电话向我汇报工作，其间顺便提到一件事。说刚刚有一个 20 多岁的年轻人来到光机所，自称是专门从北京赶到长春来的，想研制电子显微镜。当时，他们觉得这个年轻人有点太不实际了，就告诉他说长春光机所在短期内没有做电子显微镜的计划，只有一个在 5 年内派人去东德学习电子显微镜技术的计划。年轻人提出想找我谈谈，他们告诉他我正在外地开会不在家，就把他打发走了。我问这个年轻人的情况，他们告诉我，说他是个刚从德国回来的电子光学专家，是美国富兰斯学院物理系毕业的，并获得了联邦德国杜宾根大学应用物理的博士学位。我立刻问："他现在在哪里？"那边回答说："不知道，他已经走了。"我说："你们立刻把他给我找到，想方设法让他留下来等我！"所里的同志听我这样说，生怕这个年轻人失望之下立刻买票回北京，就马上四处分头找人。当天下午就在一个招待所里把这个年轻人找到了。这个年轻人果然是准备第二天就返回北京的。

我匆匆赶回去，与这个年轻人见了面。交谈中，我知道了这个年轻人的名字叫黄兰友，他是创造了被国际上称为"黄鸣龙还原法"的我国著名有机化学家黄鸣龙先生的儿子。当时，坐在我面前的黄兰友只有 20 多岁，很有朝气，很有热情。经过交谈，我发现他不是一时冲动、不切实际地提出想要研制电子显微镜的，事实上，他已经为研制电子显微镜

作了许多准备，有了一套很完整的想法。我很欣赏他的热情和才气，决心启用他。

当时，光机所已经定下了 7 个科研攻关项目，此时我不仅又把研制电子显微镜的项目列了进去，还把它作为重点排在了第一号的位置。我问黄兰友，需要多长时间。黄兰友估算了一下说大概得两三年吧。我说，不行。我只给你几个月的时间，“十一”之前一定要争取拿下来。黄兰友当时的样子很吃惊，但我心里多少有点数。我知道长春光机所经过几年的建设已经具备了较强的科研基础，培养起了一支具有较强科研能力的科技队伍。此时又遇大跃进高潮，所里的干劲冲天，团结协作精神非常好，一有问题八方支援。因此我有条件为黄兰友配备助手，提供各种有利条件，协助他高效率地开展电子显微镜的研制工作。

1958 年那一年，我们长春光机所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技术攻关，搞出了一批当时在国内领先的科技成果，有被称为“八大件”的电子显微镜、高温金相显微镜、多臂投影仪、大型光谱仪、万能工具显微镜、晶体谱仪、高精度经纬仪、光电测距仪共 8 种有代表性的精密仪器，还有被称为“一个汤”的一系列新品种的光学玻璃。1958 年 10 月，我们的“八大件，一个汤”在中国科学院举办的“自然科学跃进成果展览会”上参展。10 月 27 日，毛泽东主席参观了展览会。这“八大件，一个汤”立刻在全国科技界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人民日报》以头版篇幅刊登了长春光机所的突出成就。国家科委、国务院规划委员会也纷纷来电致贺。当时的中科院院长郭沫若、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副院长吴有训等还亲自到我们长春光机所参加科研成就祝捷大会，并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可以说，长春光机所是在全国放了一颗科技卫星。当然，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我们当年那种抢时间、搞突击的科研方式是不够严谨的，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缺乏科学态度的。但是，在当时大跃进的整体环境下，作为个体的人和个体的单位，已经不可能保持十分清醒冷静的头脑了。那时候，报纸上每天都在放各种各样的卫星，粮食卫星、钢铁卫星，好像明天就要进入共产主义了。在这种情况下，所有人的情绪都被鼓舞起来，所有人都恨不得立刻做出点什么来。当时，我们常常一连十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